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人研究

# 孔范今文学史思想述论

郭洪雷

**摘要：**孔范今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整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对人文主义文学史观的阐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组织的文学史料整理，极大地拓宽了相关研究的对象范围；其文学史编写的史述框架和史学观念，让学界看到了一种充满结构意识和人文主义情怀的修撰路径；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把握和辩证思考，为同代及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建构。先生晚年远离学术尘嚣，以口述讲学方式对文化、文学、现代性等重大问题再进行再思考、再认识，体现出一种精进不休、圆融无碍的学术境界。

**关键词：**孔范今；文学史；辩证法；结构意识；人文主义

从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来看，孔范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人的重要一员。钱理群认为，这一代学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觉的开创精神；二是互相合作，有“群体意识”。<sup>①</sup>除了以上两点外，这一代学人还有一个特点：作为“文革”后涌现的一代，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有的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的则生于50年代中后期。前者如吴福辉、钱理群、王富仁，进入80年代已将近40岁，相较于陈平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他们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思想观念已初步成型，迈进新的历史时期，他们实际上是“半个过来人”。我们强调这一点，不仅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思想“负累”，需要清理和告别，更重要的是，他们一些已然定型

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认知，在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和话语形式上，都会对后来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考察这些学人的思想、学术，更应关注他们思想资源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在历史转折期学术思想的蜕变。

## 一、“辩证法”： 一个被时代设置的思想基点

孔范今生于1942年，与吴福辉、钱理群、王富仁等人年龄相仿。从现有资料看，孔范今的学

<sup>①</sup> 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

术研究开始于1976年,这一年先生发表了两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sup>①</sup>1978年,他又在《破与立》和《文史哲》上发表了《形而上学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和《略论形象思维》两文。以上四篇文章反映了先生转折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毋庸讳言,这些文章还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这些鲜被提及的“少作”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和那个年龄段的其他学人一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构筑了孔范今学术思想的基础,成为其思考文艺问题的理论“前见”。革命导师的文艺思想,黑格尔、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是其理论探究的直接参照。普希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等19—20世纪俄苏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以及柳青、杨沫、峻青等“十七年”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他文学阅读的初始经验,培育了其最初的艺术感受和审美倾向。其二,从那时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辩证法,深深扎根于孔范今的理论思维,终其一生,“思辨性”都是其批判畸形、僵化、静止、片面学术立场和观点的思想武器,并为他提供了探讨文学史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后面的两篇文章,揭批了极“左”文艺路线对辩证法的破坏和阉割,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观出发,强调形象思维的特殊性。<sup>②</sup>直到晚年,先生依旧持守辩证思维,强调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深富意味、极有价值的创造,是把握“仁”与“礼”关系时极为微妙的、要随时加以注意的“度”,是二者结合的方法论基础。<sup>③</sup>

在学术研究开始阶段,孔范今就积极参与理论探讨。早先,陈毅曾请毛泽东修改自己的五言律诗,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信陈毅,信中帮着改了一首《西行》,并连带谈到“形象思维”。该信最初披露于《诗刊》1978年1月号。同年,《文学评论》复刊,全文转载了这封信,并发表了王朝闻、蔡仪、唐弢等人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很快,全国很多学者跟进讨论。这封信的披露,使“形象思维”问题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之后再次成为理论热点。1978年发表于《文史哲》的《略论形象思

维》一文就直接参与了这次讨论。在这篇文章里,先生强调艺术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只有把形象思维当作独特的思维规律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艺术的本质。而作为人类一般认识规律的两种具体的思维方法,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一样,本身就是一种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深化运动,其不同在于,形象思维对事物本质特性的逐步深入的把握,始终寓于形象运动的感性形态之中,因此具有想象性、情感性和个性化等规律性特点。<sup>④</sup>

参加这次讨论对孔范今文学史思想的构建意义重大。如果说“辩证法”是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构想的内在装置,那么,对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比较,对形象思维规律性特点的概括,则初步呈现了孔范今人文主义文学史观念的话语基础。形象思维的想象性、情感性和个性化特点与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先生后来对理性与非理性、祛魅和复魅的反复辨析,与其早年对人类认识规律和思维方式的思考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孔范今的人文主义文学史观实则奠基于他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和思维方式的认知,后来随着他对文学史文献资料和作家创作的充分掌握,进而融汇中西人文主义思想资源,最终将这一独特的文学史观锻造成型,并在辩证思维的驱动下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然而,早年四篇论文发表后,先生的学术思考进入了一个沉寂期。在将近十年时间里,除了参与对鲁迅、柳青、峻青等人的研究外,他更多沉入了与学界无声的思想“对话”。这种“对话”

①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破与立》1976年第5期的《“革命无止境”——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发表于《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的《“幼稚是会生长的,会成熟的”——学习鲁迅,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幼稚和缺点》。《破与立》创刊于1974年,是《曲阜师范大学学报》的前身,1980年更名为《齐鲁学刊》。

② 孔范今:《形而上学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破与立》1978年第1期;孔范今:《略论形象思维》,《文史哲》1978年第3期。

③ 孔范今:《舍下论学》,第37—3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④ 孔范今:《略论形象思维》,《文史哲》1978年第3期。

既有对同代学人的激赏和审视,也有对时代理论热潮的关注和思索。那段时间,他为同代学人的崛起感到骄傲,并为他们开拓的崭新局面所鼓舞。与此同时,孔范今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代学人研究中存在的偏误和问题。在他看来,“第三代”的失误不在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主体关怀倾向,而是对对象世界的相对漠视。<sup>①</sup>所以,在这段沉寂期里,孔范今始终思考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如何才能恢复或者说把握对象及其意义存在的本真性;二、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为什么文化、文学乃至学术观念会数次出现自我否定的反复回旋现象。<sup>②</sup>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问题影响着先生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和走向:前者落实为《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的出版,后者则体现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内在机制和文学现代转型的探索。

## 二、结构意识： 一种对话性的史学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出版于1990年,全书800余万字,分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四部分。这套书并非倾力于钩沉考订,所收作品大多也不是所谓的珍稀文献,而是那些在以往各种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的作家、作品。而这种遮蔽往往是由治史者单向的史述观念造成的。就实际而言,这一书系也是一套作品选,只不过它的目的是去除“遮蔽”,修补“对象世界”,打捞“遗落”作品。在整理、编选过程中,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梅娘等隐没于“历史”之下的作家得以“浮出水面”,其作品日渐引起后来研究者的关注。在这套书系里,原本被认为乏善可陈的20世纪40年代,也被发现是一个色彩斑斓、意味深长的富矿。对象还原所揭示的崭新的文学事实使先生认识到:现代文学是一个多维性的结构,各方面的意义也都或者说只能发生于结构之中,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价值评议都会偏离对象。

在孔范今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构想中,“结构”无疑是核心话语之一,在其对各种文学、文学史现象的思考中高频出现。在先生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变异性,在中外

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历史的帷幕一旦拉开,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而瑰丽的世界。多种因素的共时并存和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使它明显地呈现为一种活跃的复杂结构状态。意义显现于结构之中。对现代文学开展历史结构方面的研究,和带着自觉的结构意识研究现代文学的各种专题,应该是极有意义的事情”<sup>③</sup>。这里所说的“结构意识”,正是先生与时代思潮对话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结构”无疑是一个理论热词,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在人文社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与前者的对话中,孔范今首先强调“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在价值层面的悖论性:“作为历史力量的聚焦点,这两个方面特殊的结构方式则是悖论性的对峙。尽管这两个方面在深层历史目的上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历史的更新发展,但它们在对历史的认识和具体价值取向上却是背道而驰的。当它们以必不可少的前提进入历史的现实进程时,就已经给参与者施与了悖论性的心理内涵——情感价值取向与理性价值取向的冲突。”<sup>④</sup>在与后者的“对话”中,先生肯定他们对社会组织的系统论、控制论阐释:将社会组织视为一个具有自我维系能力的结构,并将整体结构分解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相互维系的子系统。<sup>⑤</sup>“超稳定结构”论启发了先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动力和影响源泉的结构性认知,尤其是作为社会整体结构子系统的“经济”,呈现出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作用和功能;而社会组织的“自我维系能力”则意味着长时段内文学史自身的补偿和修复。一旦将这种“悖论性”认识与结构性“补偿”功能对接起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

①③ 孔范今:《面对历史的沉思(总序)》,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小说卷一》,第6、8-9页,济南:明天出版社,1990。

② 孔范今:《前言》,《孔范今自选集》,第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④ 孔范今:《走出历史的峡谷》,《文学世界》1995年第2期。

⑤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279-28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在机制——一个由对立到统一的历史过程便涌现了出来。先生发现,近代以来百年历史总是不断地回旋、重复,而每次转过来都好像是回头寻找,要找到并重新拾起被冷落甚至是被遗落了的话题。对于这种现象,孔范今先生强调我们要形成两个方面的认识:一、这种现象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使历史活动的主体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中作出一无遗漏的全面选择。而当它一旦选择了某一维度的努力并把它推到历史活动的中心时,其他的方面自然会被冷落甚至是遗落。可历史的进步对那些方面的需求并未因此而放弃,当它们以其欠缺而再度升上历史的地平线后,历史便以补偿的方式重新对它们重视起来。所以,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常常要伴随着历史的曲折,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回旋”<sup>①</sup>。二、“回旋不等于重复,补偿也不同于恢复”“它是在中国历史转型的独特规约中所表现出来的螺旋式的上升”。<sup>②</sup>而这种“螺旋式的上升”的逻辑基础是历史结构的多维性,其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调控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孔范今的文学史研究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强调对历史选择必然性的尊重。1991年,他在《悖论与选择·自序》中写道:“历史只会严酷地考验历史行动的参与者,而它的运行却是不会因此而停滞的。”<sup>③</sup>历史不能假设,它的选择只能是现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诸多因素的合力中所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运行所显示出来的“自然法则”,值得治史者深入思考。这里所提到的“自然法则”是指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约·布洛赫》中所阐发的“历史合力论”。也就是说,孔范今与20世纪80年代各种结构论说的“对话”,有着深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背景。先生不是简单地接受流行性理论话语,而是在对话中完成自己对文学现代转型内在机制的论述。

其二,执着于文学现代转型中价值问题的探索。对象世界的去蔽与文学史发展内在机制的探究,构成了孔范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的两翼,而价值生成则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和贯

穿线索。因为它不仅决定着文学史叙述的标准,还涉及撰述者价值立场的选择。然而,历史直觉让先生意识到,对社会、历史的结构研究过于依赖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在价值判断方面缺乏标准,极易陷入相对主义。结构研究强调共时分析,忽视历时考察,缺乏对价值系统动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所以,20世纪90年代,他在文学现代转型研究中,不断反思五四文化模式,吸纳中外人文思想资源,探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续文化传统的可能性。进入21世纪,一种融汇了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人文主义文学史观念便呼之欲出了。

### 三、人文主义： 学术生命的超越与回归

1997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出版,先生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思考得到初步贯彻。这部文学史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在三万余言的总序和后来的探索中,先生将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在启蒙文化观规约下,人文文化的历史处境及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二、文化与文学视域中的“祛魅”与“返魅”问题。

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发端于对五四文化模式的反思。他肯定“五四精神”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一文化模式束缚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其突出表现就是启蒙主义的排他性:“对于发生在其他价值范畴里的文化、艺术主张和流派,基本取否定态度,对其近期的积极效应和远期的合理性一概视而不见。而价值评判亦呈倾斜状态,其核心则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sup>④</sup>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相关学者对启蒙主义历史责任的主动承担和角色选择,“他们以历史参与者的角度进入研究,越是投入就越是翹

①② 孔范今:《导论 论六: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发展》,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59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③ 孔范今:《自序》,《悖论与选择》,第2页,济南:明天出版社,1992。

④ 孔范今:《超越五四文化模式》,《文学世界》1995年第2期。

膀沉重”<sup>①</sup>。基于此种认识,先生从三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一、越过“五四”,前推“新文学”上限,突出梁启超在文学现代转型中的地位;二、反思“五四”,重释孔子智慧,为“新文学”接续文化筋脉;三、超越启蒙,借鉴中西思想资源,构建人文主义的价值系统。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1840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其划分依据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孔范今认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体而言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新文学所必备的条件和基本倾向,如白话文的提倡、新的文体格局、新的审美基质、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发生和发展,等等,开始萌生并自成规模。“新文学的起点不是‘戊戌变法运动’,而是它的失败之日。‘戊戌变法运动’尽管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表现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但它属于‘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对文学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和倚重。倒是它的失败,促使其代表人物调整了思路,由政治上的(严格说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转向了思想启蒙,才为文学革新运动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从而由政治上的维新运动转向了文学上的维新运动。”<sup>②</sup>这里所说的代表人物是指梁启超。在先生看来,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启蒙运动,实则是对嗣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的铺垫。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性质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梁启超的历史聚焦点及其一系列主张,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sup>③</sup>

针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孔范今先生从心理层面深入辨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运动对孔子的批判,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眼光,挖掘孔子思想所具有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先生认为,鲁迅和当时那些文化革命的先驱者,在自觉意识领域中的价值判断和在深层文化心理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非自觉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逆向结构状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面讨论的是文化,实际上着眼的则是历史,那时的批孔只是手段,变革社会才是目的。鲁迅批孔明显属于历史性行动,与以文化、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孔子评价不可同日而语。鲁迅深知,腐朽的传统文化,并非只是

孔子学说及其所开创的儒学;儒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后世儒学并非原始孔学;后世“偶像”化的孔子,亦非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孔丘。<sup>④</sup>所以,“鲁迅的批孔,实质上是在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在这个历史性的活动里,孔子更多的是作为封建传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出现的。对孔子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sup>⑤</sup>。

基于孔子及其思想在20世纪的特殊遭际,基于孔子在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思想丰富的未来意义,先生对仁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对孔子的思想智慧重新作出解读:“孔子思想中包蕴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它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孔子在其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生存的悠远的人文关怀,在今天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建构中,又显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意义。在十分古老的文化中却包含着十分深刻、丰富的未来意义,这大概是本世纪的文化批判中人们所始料未及的。”<sup>⑥</sup>正是在孔子的思想智慧里,在反思批判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再解读中,先生找到了自己文学史思想价值建构的扎根之地。

进入21世纪,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的范畴内,参照白璧德、布克哈特及布洛克等人的论说,先生继续寻绎着人文文化的发展流脉。通过考察沈从文等人的创作和相关思考,先生对人文文化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入。在先生看来,历史进步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历史不是一元的线性发展,历史进步行为与人文文化尤其是具有丰富生命内涵

① 孔范今:《超越五四文化模式》,《文学世界》1995年第2期。

② 孔范今:《“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论》,第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③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孔范今自选集》,第41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④⑤ 孔范今:《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鲁迅批孔新议》,《文史哲》1992年第2期。

⑥ 孔范今:《重新读解孔子的智慧——兼及20世纪的文化批判问题》,《文史哲》1995年第2期。

的人文精神传统常常表现为一种逆向的复调结构”<sup>①</sup>。历史进步常以人文精神传统的遗失和沦为代价,而文学常常承担一种特殊的使命:为保持人类生存或历史的健全发展,寻找那些失落的东西并作出新的阐发和诠释。

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相关,“祛魅”与“返魅”也是孔范今后期文学史思想的一组重要概念。反思五四文化模式让先生认识到:启蒙运动张扬科学理性的目的在于“祛魅”,而一味祛魅往往会伤害文学的感性特征和审美特质。相反,在启蒙运动落潮时必然出现的“返魅”过程中,文学才找回了原本属于它的东西。<sup>②</sup>启蒙文学观“对科学和理性的普遍主义态度和一元性价值论定,严重忽略了人类文化在基本属性和意义指向上的深刻差异,忽略了与科学文化既相关又相左的人文文化不可被取代的价值……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禀有异常灵性的生命存在,具有把握世界的几种不同的能力和方式,除了被启蒙运动所极力推崇的科学——理性的方式外,还有宗教的、艺术的即想象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生命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一种非理性即非分析非逻辑的独特对话方式,它以超现实的想象和对想象中的关系与功能的形象模拟,来达致表述欲望、补偿缺憾即生命抚慰的目的,同时也表示对超越自我的力量必须有自我约制的敬畏之心”<sup>③</sup>。在先生看来,经过新文化观念洗礼后的“返魅”的过程具有不容轻视的意义,它既保证了主流性文学的审美创造力,同时也为与历史现代性保持疏离甚至对峙态度的其他各派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合理依据。<sup>④</sup>

通过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不断思考,从对“悖论”与“补偿”历史结构关系的辨析,到后来从“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祛魅”与“返魅”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展开的价值探索,孔范今先生完成了自己文学史思想系统的建构,其核心无疑是“人文文化”。先生早先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直到晚年论学,才以口述方式对“人文文化”进行了自己的界说和描述:“我说这个人文主义就是人文文化,说准确了就是传统性的人文文化的流传,是这个系统,或者说是这个

传统,是这样一种文化认定……这种人文文化,它是一种信仰伦理的表现,是一种关于信仰伦理的文化。”<sup>⑤</sup>在先生心目中,“人文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学发展脉络,是一种文化传统,更重要的,它还意味着一种价值立场和伦理态度,有一种学术生命的归属感与沉浸感。在一个文学研究被充分历史化的时代,这样一种有立场、有态度、有情怀的学术思考显得弥足珍贵。

在口述论说“人文文化”的过程中,先生提到一个细节:“当然真正的科学认识,也不单单是纯逻辑的。我记得好像是列宁说过吧,高等数学也需要想象。”这里的记忆是清晰的,先生早年《略论形象思维》一文就曾引用过列宁的这句话。的确,从最初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这组概念,到后来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祛魅”与“返魅”等思辨性文学史思想范畴,在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贯穿性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坚持,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富有对话精神和文化使命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终,又回到了逻辑起点。当然,这是一个更高的起点,一个值得充分打开的文学史思想系统。在这样的“螺旋式上升”里,先生也完成了学术生命的超越与回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作家阅读史研究”(23BZW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洪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②③④ 孔范今:《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 孔范今:《舍下论学》,第32-3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